

論阿Q典型和阿Q主义

李 希 賢

《阿Q正傳》是世界上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它具有多方面的、深刻的意义。对鲁迅來說，《阿Q正傳》是他前期思想观点和艺术观点的艺术结晶，正确地研究这部作品，就能幫助我們了解鲁迅前期的思想特点和創作特点。对文学史來說，《阿Q正傳》立下了中国文学里程上的新碑，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且，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文艺理論問題，需要我們长期的研究。在当前，如何从典型理論上来研究阿Q典型和阿Q主义，却有重大的和迫切的意义。

在文学理論中，“典型形象”一般就是指典型人物形象。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是丰富多采、各不相同的。但是，任何典型形象都是在生动的、具体的和直接感知的生活图画中对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綜合，这个被高度概括和綜合的思想內容，也就是典型人物的性格的主导方面，我們把它叫做典型性格的核心。比如，李逵的革命性，曹操的奸詐，阿巴公、葛朗台和潑留希金的吝啬，奥勃洛摩夫彻头彻尾的惰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分别是这些典型人物的性格的核心。在不同的典型形象中，典型性格的核心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李逵式的革命性，只是封建社会的进步农民的本質屬性，曹操式的奸詐，只是封建貴族的特点之一，吝啬也只是剝削階級的思想性格的一个类型，奥勃洛摩夫那种彻头彻尾的惰性，主要是貴族地主寄生生活的产物。一句話，它們只是概括了一个階級（或阶层）的特有內容，而且，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多数是属于这个类型。但是，还有这类的典型形象：典型性格的核心所概括的社会內容，不是某一个階級所特有的，而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照我看来，阿Q典型充分地体现了这类典型的基本特点。因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流浪的雇农，而阿Q性格的核心是精神胜利法，这个思想并不是农民階級所特有的，它还存在私有制社会的剝削階級和幫閒文人的身上。

我們只有认清了典型形象概括生活的特点，只有把握了典型性格的核心和階級性的关系，才能揭示典型形象的本質和特征。所以，多年来，典型性格的核心和階級性的关系的問題，成了典型理論研究中的中心問題，也一直是典型問題爭論的焦点。由于前类典型性格的核心的內容和階級性的关系比較單純，比較明确，所以不是爭論的对象。另外，社会主义文学的典型性格的核心的階級性也是很明确的，也不是爭論的对象。所以分歧是发生在阿Q这类少数典型形象身上，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因为，阿Q性格的核心和階級性的复杂关系，能代表那类高度概括性的典型的一般特点。解决了阿Q典型和阿Q主义，也就解决了典型性格的核心和階級性的关系中最复杂的一个类型，也有助于解决整个典型理論問題。因此，凡是想提出典型理論的人，都不能不对阿Q典型和阿Q主义有所解釋，典型理論上的不同观点必然在阿Q形象上交鋒起来。

資產階級文艺理論家，鑑于典型問題是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中心問題，鑑于阿Q典

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企图把阿 Q 形象当作反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根据，于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它。我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对阿 Q 典型都发表过谬论，而最卖力气的，人性论的观点最系统的，莫过于巴人。综观巴人的观点，主要是两条，其一，认为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是超阶级的。巴人说：鲁迅不仅有创造“国人的灵魂”的动机，而且塑造了“国人的灵魂”的典型^①；精神胜利法是“民族的心理，即民族精神”^②。其二，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是超时代的。巴人说：“在我们的灵魂里，也发现有‘阿 Q 精神’的鬼影了。”“阿 Q 这个形象”是“中国人的性格的一个侧面 画像或典型。”^③巴人是从歪曲鲁迅的创作特点出发，进而否认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的阶级性和时代内容。因此，如何从鲁迅的思想特点看阿 Q 典型概括生活的特点，如何理解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的阶级性，怎样认识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的时代内容，在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和资产阶级人性论者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一

资产阶级人性论者为了给荒谬的理论抹上真理的色彩，总是想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他们的观点是从作家的思想实际和作品中得出来的，是千真万确的，而坚持阿 Q 典型的阶级性的人，是无视作家的思想实际和创作实践。巴人说，阿 Q 主义的确是“国人的灵魂”，因为，“这是作家自己的话，是大可不必推翻和怀疑的。因为鲁迅是在自己这样一个企图上写出《阿 Q 正传》的”，他用教训的口吻说：“我们来分析作家创造阿 Q 这个典型人物的过程，还得依循作家自己的企图追寻的。”^④我们知道，鲁迅曾多次谈过他创作《阿 Q 正传》的动机、过程和对阿 Q 的理解，但巴人和别的人性论者总是抓住下面的几段文字，来大做文章，我也把它们摘录下来。鲁迅写道：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的灵魂来^⑤。

在同一篇中还写道：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⑥

1938年在《再谈保留》一文中说：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 Q 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典型形象总是作家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的结晶，作家的生活特点、思想特点和艺术观是会反

① 巴人：《鲁迅的小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② 同①，第35页。

③ 巴人：《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蓬命集》第93页。

④ 巴人：《鲁迅的小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⑤、⑥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第77—78页。

映在典型形象中，作家的世界观和創作动机对他的創作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魯迅說，阿Q是在他的眼里所經過的、所覺察出的中国人生的艺术再現，他想通过《阿Q正傳》来暴露“国民的弱点”，并认阿Q是一个“国人的灵魂”，这些言論，反映了作者从观察生活到反映生活和評論作品这一思維活动过程，它与魯迅的生活和思想，与魯迅的創作过程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說，与阿Q典型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們从来认为，分析阿Q典型，不仅要從作品本身出发，还应该了解作家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的特点，了解作家的創作动机和創作过程。我們这样做，是希望全面地揭示阿Q典型的特点，而巴人的“依循作家自己的企图追寻”的目的，不过是想抓住魯迅的隻言片語，作阿Q典型是超階級的証据。

魯迅生活的前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經解体并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他从家庭的敗落、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辛苦而麻木的精神状态中，痛楚地感到封建僵尸統治的腐朽，他那深厚的爱国爱民的情感，促使他頑强的去探索改造旧中国的途徑。而进化論和个性解放的世界观，自然使魯迅的注意力集中于解剖旧社会的意識形态上，所以他孜孜不倦地研究“理想的人性”，中国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終于认为找出了中国落后的病根及疗治的方法，即病根在于中国的“精神文明”和“民族劣根性”，疗治也要从毀碎精神文明和改革国民性着手，向他們注入深沉的“勇气和理性”^①，而能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是文艺。魯迅既然找到了自认唯一正确的救民兴国的道路，平生又最厌恶“閉着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②的山羊式的文人，他毅然地扛起“冲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③的文艺大旗，进行韌性战斗。虽然魯迅战斗的火力是扫射封建的精神体系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他把精神胜利法当作“精神文明”和“民族劣根性”的主要內容，精神胜利現象不能不是魯迅解剖和攻击的主要对象。除了在論文和杂文中对它批判外，主要是通过《阿Q正傳》进行一次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所以說，《阿Q正傳》是魯迅前期思想观点和艺术观点的艺术总结。也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阿Q典型和阿Q主义深广的概括性和綜合性。

可以想象，当魯迅与精神胜利法发生最初的联系时，因預感它有某种深刻的內容而為它所惊动，便紧紧地抓住它，并使它一直磁石般地吸引着自己的注意力、思索力。但是，魯迅不是浮光掠影的作家，在沒有彻底地把握住对象的整体生活以前，他是不会訴諸于文学形象的，他要洞察精神胜利現象的全部內容。于是，广泛地观察，悉心地研究，虽然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思想的解剖刀也深入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历史傳統。这种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不可能只限于农民階級，而是有精神胜利法的各种各样的人。作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思想判断力，去把握精神胜利現象的完整性，如何透彻地了解它的內容和實質。經過长期艰苦的探索，魯迅基本上掌握了精神胜利法的复杂內容，同时又保持了这个思想內容的具体性和新鮮性。作为一个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魯迅是看到了不同階級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正是作者能够在一个貧僱农的身上概括整个时代的阿Q主义的现实根据。另一方面，当时的魯迅还不能用明确的階級观点来分析精神胜利法，却把它誤为“国民的劣根性”。于是，想通过《阿Q正傳》来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由此看来，不是魯迅先凭空有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創作动机，它正是作

① 《杂忆》，《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23頁。

②、③ 《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29，332頁。

者长期“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和“凝神结想”^①的结果。作者孕育阿Q精神胜利法的过程与他探索国民精神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阿Q也的确是在鲁迅的眼里所经过所觉察出的中国人生的艺术再现。

一般强烈的创作激情在鲁迅心里骚动着，他要把自己所体验的精神胜利现象的内容概括在文学形象中。鲁迅知道，把这个内容分散在几个形象中，不如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有力，而作家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动机，又决定他要在一个贫雇农的身上来概括这个内容。鲁迅在把阿Q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同时，他要努力去加深和扩大阿Q性格的核心，在符合阿Q的阶级地位和生活视野的前提下，把散布在社会上的精神胜利现象加以集中和提高，使它更突出、更鲜明和更完整，赋予它以普遍的持久的意义。鲁迅深深懂得，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愈大、愈深刻，典型性也就愈强，也就愈能发挥作者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者注意的战斗作用。当然，对于平庸的作家，要在一个艺术形象中对现实生活进行如此深广的概括，是不可能的，而伟大的作家却拥有高度概括的才能。鲁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把阿Q塑成有高度概括性和综合性的典型形象。例如，作家运用了“采取一端，加以改造”^②和“杂取种种人”而“合成一个”的典型化的方法，来综合和概括整个时代的精神胜利法。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撷取某些人物做阿Q的模特儿，并把与阿Q性格相同或近似的一端采取来，加以改造，而成为阿Q形象的有机部分。根据回忆，阿Q的原型不只是有农民阿贵（或阿桂），而且“较多的情况是采自名叫桐少爷的本家，他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还有“富有耍世风度”的“老秀才”^③。鲁迅还通过讽刺与抒情相结合的方法来扩大和加深阿Q性格的核心，其内容，一是点破那个时代阿Q主义的普遍性（如“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一是指出封建文化的历史传统与阿Q主义的关系（如，阿Q的“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効力”。）。这种方法丰富和补充了阿Q典型，对它的概括性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再从《阿Q正传》本身来看，阿Q典型也的确概括了那个时代精神胜利法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它揭示了当时的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共同性，而不是某些同志所断定的，它们之间只有形式上的类似。在典型理论上，阐明这种共同性是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去把握不同阶级的特性时，它们之间的某点共同性是无关宏旨的，是不必计较的，因为它不影响我们去认识对象的本质。但典型形象不是阶级性的图解，它是写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个人，而人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是处在互相依存的统一体中，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有密切的联系，在思想意识上也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具有阶级性，但在私有制社会里，具体的人的阶级性并不是纯粹的。列宁说：“‘纯粹的’现象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参杂其间。”^④某些属于特定阶级的个人，受

① 《“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23页。

②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94页。

③ 详见周建人：《关于阿Q这一人物的来源》。《东海》1961年12月号。

④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页。

着时代思潮和典型环境的冲击，他的性格特征可能不是該阶级所固有的，或不是該阶级所特有的。有时，这个思想性格的内容包含着社会的基本矛盾，能够反映时代的面貌，而思想深刻的作家就能洞察它的重大意义，并把它当作典型人物的性格核心。阿Q典型所概括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这一类的社会现象。这类典型反映现实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具有更大幅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阿Q这类典型与李逵那类典型的根本区别，在于前类典型性格的核心内容不是一个阶级所特有的，后者所概括的社会现象只是一个阶级所特有的。因此，我们在阿Q典型中揭示当时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共同性，不能认为是无关宏旨的，不能說是不必要的。

当然，有的同志不談或者否认不同阶级精神胜利法的某些共同性，是他們沒有从阿Q形象中看到这一点。的确，从《阿Q正傳》和阿Q典型本身是难以确定这种共同性的。《阿Q正傳》对精神胜利法的描写，举例來說，与《堂吉訶德》和《奥勃洛摩夫》对主观主义和惰性的描写是不同的。堂吉訶德沉溺于幻想世界里的主观主义的战斗精神，有桑乔这位幻想做总督、在大問題上缺乏现实感的侍从相呼应；奥勃洛摩夫彻头彻尾的惰性有懶得发霉的僕人查哈尔作陪衬。这些不同阶级的人在主观主义和惰性上的異同，通过对两对主僕这一部分性格的分析，便瞭然了。与此不同，在《阿Q正傳》中，魯迅是把一般作家写长篇小说的内容，濃縮在一个短短的中篇里，作品的主题、人物和情节是高度集中的。他把被压迫阶级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描写得很具体很充分，却没有也不必描写赵太爷之流的精神胜利法及与阿Q的关系。于是，魯迅运用了通过个别概括一般的艺术方法，把精神胜利法这个时代的普遍思想轉化为个人性格的特殊性，使个性体现出时代的普遍内容，但以个性的形式早之于艺术形象。不仅精神胜利法的一般表现特点与流浪雇农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視野相吻合，甚至揭示它的每个细节和每句話都是个性化了的，而封建統治者是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表现这个思想的。比如說，封建統治者排斥異端的思想不一定表现在葱长葱短等瑣事上，可能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上，等等。因此，我們不易从阿Q典型中看出当时不同阶级精神胜利法的某些共同性。所以，我們只有深入阿Q性格隱秘的最深处，把隱藏有阿Q主义的骨髓和血肉里的一切都暴露出来，才能了解这种共同性，也只有从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现象的对比分析中，才能洞察阿Q性格深广的概括性。同时，代表魯迅前期思想观点和艺术观点的《阿Q正傳》不是孤立的，他同期的論文和杂文的基本思想与《阿Q正傳》是一致的，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們以及当时的历史資料都作为研究阿Q主义的参考。

“精神胜利法”这个概念是作者自己提出来的，从《阿Q正傳》来看，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这样的邏輯思維过程：失敗（被辱、被打和被搶）——緊張的思維活动（主要是咒罵加幻想）——精神胜利（“心滿意足”）。阿Q很忌諱他的癩头疮，但遭羞辱时，便嚷道：“你还不配”，于是把它幻想为光荣的高尚的癩头疮。虽然是被人打了，只要他咒罵一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便心滿意足了，因为一环扣一环的緊張联想活动，把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例如，他靠此方法，把自己由“第一个能够自輕自賤的人”，上升到“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而得胜。假若它不能慰藉失敗，便从实打自己到幻想是打別人，而感觉精神胜利了。他虽然对自己先前的“行状”并不清楚，却虛誇祖先的闊，虽然連老婆也沒有，却幻想他的儿子会比文童們闊得多。阿Q就是这样地把缺陷幻想为优点，把痛苦幻想为欢乐，把失敗幻想为胜利，把虛幻幻想为现实。显然，阿Q

的精神胜利是由于他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和屈辱的地位，而是凭藉精神活动——幻想和咒骂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这种精神胜利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封建统治者不仅不敢与民族的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也没有正视屈辱地位的勇气。他们不是以“光荣的癞头疮”得意，而是以“无名肿毒”驕人，在他们看来，“红肿之处，豔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①。他们一方面歌颂当时的腐朽制度，一方面缅怀过去的所谓黄金时代，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闔宇崇楼，珠玉犬馬，尊显胜于凡人。”^②他们不只是“宁蟠伏堕落而恶进取”（《摩罗诗力说》），而且为奴隶地位所陶醉，“左隣已奴，右隣且死，擇亡国而較量之，冀自显其伟胜。”^③统治者的“自大与好古”，无非是为了掩藏自己的失败。他们在外交上失败了，也是靠咒骂和幻想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据《景善日记》载，慈禧被使馆逼得无法，幻想有什么神力帮助，每天坐在宫中，念神团咒语七十遍，念毕由太监李蓮英启奏，竟說又被咒死了一名洋人。总之，阿Q主义者是用瞞騙，用幻想和咒骂来为自己的失败造条奇妙的逃路。

妄自尊大的排斥异端的思想，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内容。阿Q最厌恶假洋鬼子，这并不是对富贵子弟的阶级仇恨，只因后者进过洋学堂，去过“东洋”，剪过辮子。阿Q嘲笑城里人，因为他们把未庄叫“长凳”的称为“条凳”，煎魚不象未庄是加葱叶，而是放葱絲，阿Q也鄙薄乡里人，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魚。这种排斥异端和自大的思想，在当时统治阶级身上表现最为强烈。统治阶级“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迁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④这种企图用旧中国的“精神文明”来排斥和詆毁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他们说：“外国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他们叫嚷輪船、铁路和电报是“奇技淫巧”不能学，說照相是摄取人的“精神”的“熾光”。大学士倭仁上書称，設同文館教天文算学是“变而从夷”，結果将是“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熾”^⑤。这些害怕新事物而主張退到“美好”的旧时代的人，对外往往是主战派，但是“問其所以能战，所以求胜之具，亦不过掇拾三代之遺文，补葺汉唐之盛事，以为区区之論，而鞭倭俄而笞英法。”^⑥原来是用精神文明去对抗帝国主义的快枪大炮。就是以曾國藩、李鴻章为代表的有一定现实感的新官僚，虽然承认“洋人”厉害，主張向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学习，但也是企图以“洋务”的风气維持封建僵尸的統治，他們“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⑦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排斥异端的思想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千多年来，以个体的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

① 《隨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95頁。

②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6頁。

③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6頁。

④ 《看鏡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01頁。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本第四十卷，第25頁。

⑥ 馬建忠：《适可斋記言》（刻印本），第三卷，第24頁。

⑦ 《补白》。《鲁迅全集》第三卷，第79頁。

度，加上长期封建割据状态，不仅把剥削阶级也把被剥削阶级的落后羣，培养成思想閉塞、孤陋寡聞、目光短淺、故步自封和守旧排新的人。他們的排斥異端，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形势下，为保存傳統的制度和傳統的思想习惯所作的掙扎。虽然不同的阶级排斥異端的阶级本質是不同的，但是，在保守性、狹隘性、地方主义和狹隘的民族主义等思想方面，却有一定的共同性。

阿Q在现实中的不断失敗，又迫使他寻求了一种更能麻木自己的方法，这就是对被侮辱被損害的健忘。例如，他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于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輕松些”，甚至有些“高兴”了；挨了秀才的竹槓，“似乎一件事已經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掛碍似的”。这种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去忍受凌辱的方法，竟使他連歪曲的反抗性也沒有，甚至把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建在一起，对无辜被杀而处之釋然。当时的統治阶级怎样呢？他們对異族的侵略是一向健忘的。从鴉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不过半个世紀，封建統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国家簽訂了一系列喪权辱国的条約，割讓大片領土，賠償了巨額黄金，帝国主义的鉄蹄踐踏了祖国广大領土，他們到处燒杀奸擄。对中国历史上这个少有的屈辱年代，封建統治阶级何曾有过坚决的報仇雪恥的思想和行动呢？何曾不是处之釋然泰然或忘得干干淨淨呢！

总起来說，《阿Q正傳》中所描写的精神胜利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統治阶级、幫閑文人和农民中的落后层都有的一种思想，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产物，这种共同的历史背景就决定了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共同性。而且，不同阶级的阿Q主义虽然具有各自的阶级特点，但它們又是互相影响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有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共同性，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有精神胜利法的人，都是不敢正視自己的屈辱地位，不敢对侵略者和压迫者作勇敢的斗争，在政治思想上有严重的妥协性和軟弱性，并用幻想、联想和咒罵来維持精神上的平衡状态和慰藉自己的失敗。显然，把上述的共同性仅仅归結为形式上的类似或内容上的旁通，是不符合事实的。恩格斯在談到封建貴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各自的阶级的道德的同时，也指出，这三种道德“表現了同一历史发展上的三个不同阶段，这就是說，它們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就此而言，它們已不能不包含許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經濟发展的阶段，道德論也必然多多少少互相吻合。”^①既然作为思想意識形态之一的道德，在私有制社会不同的阶级那儿，除有不同的阶级性外，也还有“許多共同之处”，那么，只要我們也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阿Q主义，就会看出当时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共同性，就不会否认阿Q典型是高度地概括了这种时代的普遍精神。

二

但是，能否据此說，阿Q典型只是概括了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的共同性，而沒有阿Q所屬阶级的特性呢？资产阶级人性論者說精神胜利法是我們“民族的共同心理，即民族精神”，当然是不承认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阶级性。因为所謂“民族的共同心理”、“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96頁。

族精神”和“国人灵魂”都是一个意思，即不带阶级性的国民性和民族性。象阿Q这类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是否属于特定的阶级呢？怎样去确定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阶级属性呢？这是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中心问题。

在文学史上，典型形象概括社会生活的类型不只一种，确定这些典型人物的特点与阶级属性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样。例如，莫里哀的阿巴公的思想性格是单一的，“吝啬”是他吞噬一切的绝对情欲，描写阿巴公的情节是为了淋漓尽致地塑造出吝啬性格的丰满和完整，我们只要对吝啬作深刻的分析，便能揭示阿巴公典型的特点和阶级属性。这种单一思想性格的典型人物，在文学史上是不多的，而典型性格的核心与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结合一体的典型形象，是最多的。比如，宋江这个人物是在义气（聚义革命）和忠孝等思想性格的矛盾中统一起来的，他由率众起义反抗宋王朝到背离众望而受招安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就是他的忠孝观念战胜义气的过程，我们只有认清了宋江思想性格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才能真正把握宋江这个复杂的性格。再如，堂吉珂德的性格核心是脱离现实的主观主义的战斗精神，而正直、善良和爱情专一，对理想社会制度的向往，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以及贵族的尊严与自傲，等等思想性格，都是与主观主义的战斗精神有内在的联系，而又不是简单地从属于典型性格的核心。因此，堂吉珂德典型的审美特性，除了悲剧这一确定性外，还有审美的多样性：从丑、崇高到美。无疑，如果只抓住堂吉珂德性格的某一局部方面，只会得出片面的、错误的结论。我认为，阿Q典型的性格也是丰富的，我们应该先从阿Q性格的整体关系中来确定这个典型的阶级属性。

阿Q性格的核心是精神胜利法，但精神胜利法并不是他唯一的性格。这个辛亥革命时期的流浪雇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象所有的贫苦农民一样，受劳动，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可是，阿Q卖身求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饥饿威胁着他，阶级的本能唤起了他的不平。辛亥革命的风暴引起了城乡的大骚动，阿Q从直观上看到革命与自己的利益有联系，慨然摆脱了对革命所持的封建传统观念，由“深恶而痛绝之”到“神往”进而“投降”革命党了。此后，他盘上辮子，主动地要和革命党结识，他按照自己对革命的理解去探索革命的道路。阿Q在宣布投降革命党之夜，思想的亮花是怎样迸跳雀跃呵！他幻想着革命将给他带来的权力和幸福，筹划着革命后的快乐日子，虽然显得可悲可笑，但阿Q那种盲目而执着的革命要求，却是显而易见的。革命引起阿Q说不出的新鲜和高兴，与赵太爷和举人等说不出的恼闷和惶恐，恰是要革命与反革命的鲜明对照，这正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①阿Q的真能做和对革命的向往与追求是阿Q性格的重要方面，它表明阿Q毕竟具有农民阶级的本质属性，它对我们了解阿Q典型的阶级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阿Q不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象封建社会里的许多农民一样，他受着封建意识的毒害。他严守“男女之大防”，尊奉男女关系的奇妙逻辑：“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他既用各种方法惩治她们，却又寻求机会戏弄她们，求之不得，便说女人是“假正经”。阿Q虽然排斥女性，却也需要女性，他想：“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断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阿Q需要

① 《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7页。

的是能傳宗接代的人，不这样，他便不能摆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精神压迫。

因此，阿Q的性格是丰富的、复杂的，他的性格核心与性格的多样性是融合一起的。也就是說，阿Q性格是精神胜利法与真能做、要求革命和傳統的封建观念等思想内容的統一体。孤立地分析阿Q性格的各个方面，好象彼此矛盾，甚至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但只要把握住它們內在的联系，不难看出是个統一的完整的生活图景。思想性格的每一方面都是依靠其它方面而獲得意义的，都是阿Q思想性格的有机部分。分析典型人物，特别是分析象阿Q这样复杂的典型人物，應該在把握思想性格的各个方面及其內在联系的基础上来确定典型形象的特性。如果把典型性格的核心、或典型性格的某一个方面来代替整个典型性格，那实际上，是一个性格特征一个典型的观点，它必然会得出片面的結論。过去有人仅仅看到阿Q对革命的响往与追求，而忽視了阿Q性格的其它方面，便說阿Q是革命农民的典型，当然是錯誤的。但仅仅根据精神胜利法来确定阿Q典型的階級性，也未必不是片面的。典型人物象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的某一方面可能和另个階級有共同之处，但整个的思想性格却是和另个階級根本不同的。阿Q时代的精神胜利法是封建統治階級、幫閒文人和部分农民都有的，但阿Q的質朴、他的真能做和对革命的响往与追求，却是当时的統治階級所沒有的。所以，只要我們把握了阿Q性格的整体关系，便不难看出，他是旧中国的一个有革命要求却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农民典型。阿Q也就不是不帶階級性的“国人的灵魂”了。

当然，不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階級性，也不能真正認識阿Q典型的階級性。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阿Q典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支持起了阿Q的整个性格，它对阿Q成为阿Q典型起着决定作用，正如决定堂吉訶德典型的是他背离现实的主觀战斗精神，决定奥勃洛摩夫典型的是彻头彻尾的惰性一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标志着阿Q典型是魯迅对世界的艺术发现，由于它是《阿Q正傳》主人公的性格核心，还直接决定着該作品的性質和主题。对鑑赏者來說，阿Q典型對他們磁石般的吸引力，那种搖撼灵魂的力量和巨大的針砭作用，也主要取决于他的精神胜利法。而且，长期以来，精神胜利法一直是阿Q典型問題爭論的焦点。这一切說明，必須充分地揭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階級性。

上面說过，当时的統治階級、幫閒文人和部分农民都有精神胜利法，不同階級的精神胜利法还有一定的共同性，阿Q典型也概括了这种共同性。但是，并不难找出不同階級的阿Q主义的階級特性。关于这一点，我們只要指明它們产生于不同的階級根源和表现为不同的階級实質，便足够了。順便补充几句，运用这种方法，能够揭示所有概括了某种共有的社会現象的典型的階級性。举例來說，奥勃洛摩夫和查哈尔都很懶惰，可是他們的惰性仍然有各自的階級性。主人彻头彻尾的惰性是剝削階級寄生性的产物，它与压迫和奴役三百个查哈尔是联系在一起的，僕人的惰性是由于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做了主人的奴隶，从而染上奥勃洛摩夫习气。不仅如此，奥勃洛摩夫虽然懶惰，但还要踢打和辱罵僕人，查哈尔虽然懶惰，还不得不服侍主人。

不同階級的阿Q主义的階級性，当然不象惰性的階級性那样易于識別，但从《阿Q正傳》及当时的历史中可以找出来。阿Q时代的精神胜利法是阿Q时代的思想意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产物。在这共同的历史背景中，不同的階級产生精神胜利法的根源是不同的。鴉片战争前，封建統治者一直过着閉关自守和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們故步自封，总以

为老大的封建帝国万古千秋。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他们“迷信‘天朝’万古不朽的这种幻想也就消失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那种野蛮的绝对的闭关陋习也被打破了。”^① 面对强大而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虚弱完全暴露出来了。吓破了胆的封建统治者当然不敢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得不处于被胁迫的傀儡地位，他们因此有了畏外的奴性心理，既不敢正视现实，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害怕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中国的经济变革和动摇他们的统治。与此同时，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湧，统治制度眼看要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完全失去了自命不凡的驕态，他们既无能改变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又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为了慰藉自己的失败，便需要寻求精神上的支柱。于是，用怀古和頌古来掩饰现实的失败，用鼓吹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来詆譏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用妥协、投降和咒罵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于是产生了精神胜利法。因此，精神胜利法是当时没落的统治阶级必然的产物。

但是，阿Q这类被压迫者为什么也有精神胜利法呢？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有人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完全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毒害的结果，有人还说它是从统治阶级那里移植过来的。反对这种外因决定论的人，认为被压迫阶级也会自生精神胜利法。照我看来，当时被压迫阶级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有其外因，也有其内因，而不只是某个单方面的原因。

的确，当时的被压迫阶级产生落后意识的外部力量，是很强大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文化奴役同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是相依而来的，在摧残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摧残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文化，帝国主义者以及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杂交而生的封建买办阶级，大力鼓吹帝国主义的文明，企图造成羣众畏外媚外的奴性心理，并竭力宣扬中国封建文化糟粕，用落后的思想去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②。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特别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宗教观念和迷信观念构成一条精神上的紧箍咒，箍在农民身上，农民那里动弹得了。鲁迅說得好：

尊孔，崇儒，专經，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节励天下”。^③

虽然封建统治者往往是不忠不孝不节的，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并不信从，只是“‘怕’和‘利用’”^④，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把这些精神毒素强迫灌輸給人民，人民中的落后层就会受到毒害。表面看来，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似乎与中国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教观念和迷信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实际上是有关系的。这些精神上的毒液在阿Q血肉中蠕动着，它们是催发阿Q主义的酵母。阿Q的严守“男女之大防”和“不孝有三无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解放出版社1950年版，第40頁。

② 参看周揚：《肅清殖民主义对文化的毒害影响，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文艺报》1958年第19期。

③ 《十四年的“讀經”》，《鲁迅全集》第三卷，第95頁。

④ 《馬上支日記》，《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1頁。

为大”的思想，是“合于聖經賢傳的”，阿Q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未来，对强者凌辱一再的忍讓、自譬自解和健忘，对自己无辜被戮而委之命运，这与宗教观念和宗教道德也是有内在的联系。而且，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处于帝国主义胁迫和人民反抗之下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比过去更需要用落后思想从精神上束縛人民，他們除了繼續向人民灌輸封建道德、宗教观念和迷信观念外，还要寻求一种更能麻木人民的方法。关于这一点，鲁迅的《春末閒談》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說：細腰蜂是残忍的凶手，牠用神奇的毒針螫青虫的运动神經，青虫便麻痺为不死不活的状态，細腰蜂便在青虫身上生下蜂卵，幼蜂便直接从这不活不烂的青虫吸取食料。鲁迅借着这个比喻說：中国的“治人者”对于“治于人者”早有过这种黄金世界的理想：“要服从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須不死。”精神胜利法这一类的精神麻醉剂，正是“治人者”梦寐以求的神奇的毒針，被压迫者打了这种麻醉針，便处于如青虫的境况，他們“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樞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①。精神胜利法既能安慰統治階級又能麻痺被統治階級的“思想中樞”，統治階級当然要使它成为时代的思想潮流，农民階級中的落后羣不能不受他的毒害。所以，从本質上來說，阿Q是被帝国主义的鉄錘和封建主义的鉄砧打扁了的人，階級压迫和階級奴役是造成阿Q精神发展的畸形性質的主要原因。

但是，外因是通过內因起作用的。如果阿Q这类农民本身沒有弱点，就不会受統治階級思想的毒害，也不可能产生精神胜利法。要着重指出，有人认为当时整个农民階級都有精神胜利法，并从农民階級的局限性来寻找根源，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我們知道，从鴉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包括农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澤东同志說：“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結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鴉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現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頑强的反抗精神。”又說：“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撓、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②这种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是近百年中国农民階級的主导精神，这种斗争精神与精神胜利法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同时存在全体农民身上。因此，精神胜利法只是农民階級中落后羣众的一种思想。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些农民是处于小生产的个体經济状态中，他們“受着小生产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③，比較严重。那种盲目的自高自大的排斥異端的精神胜利法，正是思想狹隘和思想保守的产物。鴉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傳統的思想习惯开始动搖了，农民受的压迫和剝削加重了，在这新的形势下，这些农民排斥異端的思想更为严重。同时，由于狹隘的和保守的思想作祟，他們不可能摘掉箍在头上的由封建的倫理观念、宗教观念和迷信观念构成的精神紧箍咒，还是习惯于把統治階級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平民……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④，也主要的是这一部分人。他們难以

① 《春末閒談》。《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05—307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26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4頁。

④ 《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17頁。

逃脫受精神胜利法毒害的危运。

而且，这些受狭隘性、保守性、散漫性和孤立性等思想限制的农民，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来领导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不可能寻求正确的解放道路，敌友我的界限是不清楚的。他们不满意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但不能团结一致的展开斗争，而代之以盲目的孤立的个人反抗，在强大而凶残的敌人面前，不能不遭到失败。这样，他们便处于这种尖锐的矛盾中：既不满现实，又改变不了现实，也不知道变革现实的正确途径，于是寻求了一种妥协的方法，即用幻想和咒骂的精神胜利法来发泄仇恨和安慰自己。

一般落后农民的精神胜利法是这样产生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这样产生的。虽然《阿Q正传》不象《奥勃洛摩夫》那样细腻地描写病态性格的形成过程，阿Q是带着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出场的，但造成阿Q主义的原因还是深刻地揭示出来了。阿Q所生活的未庄，正是“那个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鲁迅语）的时代的一隅。在这里，压迫阶级凶残而狡猾，被压迫的群众愚昧而精神麻木，阿Q这个流浪的雇农便被践踏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不仅受着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剥削和压迫，肉体上和精神上还受着“闲人”们的凌辱与折磨。起初，阿Q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对那些藉端头疮而凌辱他的人，他总是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但失败的总是阿Q，他便改用“怒目而视”来反抗，可是又遭到更沉重的打击。阿Q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显然，“你还不配”的精神胜利法是失败者不得已而采用的报复方法。阿Q不是先进氛围中的精神麻木者，而是精神麻木群中的精神麻木者。阿Q不知道他应该团结谁，应该反对谁，而王胡和小D这些阿Q的弟兄，也不知道应该团结谁，应该反对谁。阿Q和王胡、小D不仅不能同命相怜，一致对敌，反而互相折磨。阿Q和王胡打的“肉搏”仗，阿Q与小D的“龙虎斗”，大大地增加了阿Q的悲剧气氛。阿Q只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仇敌，他宣布投降革命党后，打算这样来处理未庄的人，他想：“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阿Q的一生，孤苦零丁，没有引路人，没有同情者，生活上不能温饱，精神上没有安慰，既要活下去，便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寻找出路。他盲目的、孤立的个人反抗是失败了，他没有从宗教信仰中寻找精神上的寄托，而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反抗现实和安慰自己，便是很自然的了。

后来，阿Q受的打击愈来愈多，他就更要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在辛亥革命震动未庄的那些日子里，阿Q对人生在作新的探索，他打算从投降革命党来寻找出路。可是，阿Q毕竟要在时代的悲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不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的辛亥革命，不可能克服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思想局限，不可能把他们由盲目的孤立的个人反抗引向有组织的自觉的斗争。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和反动派妥协，做了“革命党”的假洋鬼子又不准阿Q革命，这时，阿Q“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后来，这个追求革命的人竟做了“革命”牢狱的囚犯。阿Q革命的道路被堵塞了，精神上的新寄托被勾销了。他不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也不理解自己的遭遇，但精神上又需要一种安慰，他只有回头向精神胜利呼吁求援。并在“大团员”这个悲惨的时刻把它推到顶端，“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而释然泰然。

综上所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农民阶级落后羣的不觉悟和

在反抗斗争中由于不断的失败所产生的怯懦心理，对压迫者不满而又找不着正确的斗争道路，便用咒骂和幻想这种歪曲反抗形式来反抗现实，并慰藉自己，这是农民阶级落后羣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原因。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中的落后羣在反抗斗争失败以后，是很易造成精神上的畸形发展。恩格斯在谈到十七世纪德国的小市民时，写道：“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失败了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而且被阻滞住的发展的产物；德国小市民阶层具有了三十年战争和它以后的时期——这时候其他各大民族正经历着一种猛烈的成长——所造成的特殊的畸形发展的性质：怯懦、狭隘、软弱无力、无任何开创能力。……直到后来我们的工人阶级才把这些狭隘的圈子给以打破。”^①虽然十九世纪末中国农民阶级的落后层与十七世纪德国小市民的状况并不完全相同，德国小市民阶层精神上的畸形发展与当时中国农民的精神胜利法也有区别，但是，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即小生产者在斗争失败后是会形成精神上的畸形性质，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对我们了解阿Q这类农民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原因，有指导意义。

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还表现为不同的阶级实质。从封建统治阶级产生精神胜利法的根源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象他们宣扬的哲学观、宗教观和伦理观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安慰自己、麻痹人民，以拯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制度。封建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是“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②，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对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不是个别的强者对个别弱者的凌辱，也非小尼姑的面颊被阿Q擰了一把可比。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精神胜利法的特点之一，对内表现为压迫性、奴役性和欺骗性。

与此不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通过贫雇农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地位表现出来的，它与被压迫者的命运和遭遇是连系在一起的。不是阿Q有了精神胜利法而失却了他的阶级性，而是精神胜利法复杂了他的阶级特性。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首先表现为被压迫性、被奴役性和自欺性。在阿Q看来，他的每一行动是起于失败，訖于胜利，实际上他何曾得到一次真正的胜利，他的精神胜利总是与被侮辱被损害连在一起的。阿Q说他姓赵，细细的排起来还比秀才长三辈，虽然使旁听者肃然起敬，却挨了赵太爷的耳光，受了地保的训斥，还陪谢了二百文酒钱。他排斥异端，却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辱弄女性，的确得到闲人们的“赏鉴”和自感“飘飘然”的胜利，但尼姑“断子断孙的阿Q”的诅咒，却引起了阿Q的“断子断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的恐怖，这个恐怖又导演了那幕向吴妈求爱的悲剧，结果，挨了秀才的毒打，赔偿了仅有的生活物资，还招致了失业的苦痛。阿Q的处境是太悲惨了，在敌强他弱的形势下，逼迫他用降低自己人格的精神失败法（“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和用抬高别人的人格（“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方法，乞求强者少折磨他，却是无效，因为强者要的是实际上的胜利。阿Q是富于幻想的，他曾经观察过和思索过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也感到世界于他有些“古怪”，但从未把它深究一步，反而把思考的出发点和结论都停滞在精神胜利法的僵死公式中。为了保持精神上自足的状态，他用抽象的胜利观念掩盖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事实。非常明显，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落后农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第179页。

② 《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6页。

的一种自慰剂，它只能自欺自害，而封建统治者的阿 Q 主义固在自欺，更是欺人害人。被压迫者不解脱这种精神枷锁，就不能前进一步，由于对自己的处境不知所以然，就大大地妨碍了他斗争的自觉性和行动起来的明确性。如果说，“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①那么，被压迫者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上不能不是这桌人肉筵宴上的一碗可口的菜！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统治者，既要做“主子”又要做“奴隶”，很自然地具有“凶兽”和“羊”的两面性，“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②这个特点也反映在精神胜利法中。封建统治阶级在人民面前是凶兽，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对国内人民表现出压迫性、奴役性和欺骗性；封建统治阶级在侵略者面前是“羊”，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对外表现为失败主义和奴隶主义。鸦片战争后，与广大人民群众顽强的反帝斗争相反，封建统治阶级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在1876年的“出使日记”中，称赞帝国主义极守信义，为“忍隐含垢”的对外政策而洋洋得意，他写道：“程子大儒论‘本朝五不可及’，一曰‘至诚待夷狄’。北宋以前，规模广博，犹可想见。……汉高祖一困平城而遣使和亲，唐太宗至屈辱突厥，开国英主不以为諱。终唐之时，周旋回纥吐蕃，忍隐含垢。王者保国安民，其道故应如此。”^③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对内的统治，宁可对外一切屈服，他们无耻地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有些人还被傀儡地位所陶醉，说什么：“列强果行分割（中国），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李鸿章的磕头外交不也是这样一幅奴性的丑脸吗？

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有妥协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他毕竟不是卑躬屈膝的奴才，也不是受了凌辱而毫无反抗表现的弱者。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独有阿 Q 不表格外的崇奉。赵太爷在晚上破例点灯，全家坐等阿 Q，他却是慢悠悠而来，懒洋洋而去，凶残而狡猾的赵太爷不能不大为“失望、气愤而且担心”。阿 Q 在未庄是个不驯服的浪子，他对革命的向往与盲目追求使未庄人大为震动，他高呼“造反了！造反了！”更引起了剥削者的恐怖和战栗，连那位不准阿 Q 姓赵的太爷，也吓得怯怯的迎着他叫“老 Q”。阿 Q 的“怒目”，咒骂和幻想，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所作的挣扎，他的精神胜利法与肉搏较量法，都是他采用的报复方式。当然这是一种歪曲的反抗，它既不能触动统治阶级一根毫毛，也无助于自己境遇的改善，阿 Q 的悲剧也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既然阿 Q 是旧中国一个有革命要求但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农民典型，既然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产生于不同的阶级根源，并表现出不同的阶级实质，那么，巴人有什么理由否定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的阶级性呢？有什么理由说阿 Q 主义是“民族精神”，从而在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之间划上等号呢？也许巴人会說：鲁迅不是想通过《阿 Q 正传》来暴露“国民的弱点”吗？他不是想把阿 Q 写成“我们国人的灵魂”吗？难道鲁迅的世界观，创作动机与作品之间有矛盾吗？

① 《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15页。

② 《忽然想到之七》，《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6页。

③ 郭嵩焘：《使西域纪程》（刻本）卷上，第3页。

我們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对創作是起指导作用的，阿Q典型正是魯迅在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下創作的。作家的創作动机对他的作品也是要发生影响的，阿Q典型的深广概括性与魯迅的創作动机是有密切联系的。可是，不能因此否认作家的世界观和創作动机与創作效果之間是可能有矛盾的，这种矛盾，常常在古典作家身上发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就是明显的例子。不必諱言，魯迅的創作动机和他对阿Q的某些認識与阿Q典型是存在着矛盾的。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是由于：魯迅用科学地認識现实的方法对精神胜利現象所作出的邏輯判断与用艺术地認識现实的方法所創造的典型，这二者之間有差別和矛盾，換言之，作家的主观思想和典型形象的客观意义有差別和矛盾。

典型形象是作家正确地运用了艺术地認識现实的方法創造出来的。創造了典型形象的古典作家，在世界观上都有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往往不能从理論上去認識他所看到的社会現象的全部意义，甚至有錯誤的認識，这当然会損害他的創作。但是，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經驗，有敏銳的觀察力，能从大堆的社会現象中抓住最有意义的事物，能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間的联系。而且，艺术地認識现实的方法，要求作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生活，所以他創造的典型形象是忠实于生活的。高尔基說：“文学家的社会經驗越丰富，他的見解就越高，他的精神的視野就越广，他就越能清楚地看見世界上什么跟什么相毗連，以及这些彼此接近和毗連的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①杜勃罗留波夫也說：“一个感受力比較敏銳的人，一个有‘艺术家氣質’的人，当他在周圍的现实世界中，看到了某一事物底最初事实时，他就会发生强烈的感动。他虽然还没有能够在理論上解釋这种事实的思考能力；可是他却看見了，这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別的东西，他就热心而好奇地注視着这个事实，把它摄取到自己的心灵中来，开头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形像，加以孕育，后来就使它和其它同类的事实与現象結合起来，而最后，終於創造了典型，这个典型就表現着艺术家以前观察到的、关于这一类事物所有个别現象的一切根本特征。”^②在典型形象中，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再現了生活中的本質真实，人物的原有屬性和各种关系更集中地表現出来了。因此，儘管过去的作家沒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也不是为了創造一个阶级的人物来进行創作，但他笔下的典型人物不能不是一定历史时代一定阶级的人。虽然魯迅把精神胜利法誤作“国人的灵魂”，并想通过阿Q来暴露“国民的弱点”，但是，他不能把典型人物当作自己思想的傳声筒，不能在作品中赤裸裸地敘述他对阿Q主义所作出的邏輯判断（虽然偶尔采用諷刺与抒情相結合的方法，直率地表示自己对精神胜利現象的看法，但仅仅起补充阿Q形象的作用）。魯迅要描写精神胜利現象，他必須遵循艺术認識现实的法則，他只有根据丰富的生活經驗和艺术想象，并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才能写出阿Q主义的实質。当作者按照生活中本来的样子讓阿Q行动的时候，阿Q不能不是处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典型环境中的人，不能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人。现实生活中找不着不帶阶级性的人，文学是創造不出脱离阶级的“国人的灵魂”典型。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阶级性是蘊含在《阿Q正傳》中，它是客观的存在，并不因作者說过一些什么話而異質。

魯迅在認識精神胜利現象时，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思維方法，即用艺术地認識现实的方法

① 高尔基：《文学論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頁。

②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64頁。

創造了阿 Q 典型，用科學地認識現實的方法敘述他的創作動機和對阿 Q 的理解。一般說來，科學地認識現實的方法和藝術地認識現實的方法都可以深入事物的本質，掌握它的內容和意義。但要這兩種方法都正確地去揭示同一事物的意義，不是任何作家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作得到的。文學史上的許多偉大作家，都善於運用藝術地認識現實的方法去反映生活的本質真實，而當他們用科學地認識現實的方法去認識同一對象時，往往得出浮淺的、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結論，與他的作品的主觀意義有着一定的矛盾。這個原因是不難理解的。科學地認識現實是要對具體現象進行抽象和概括，若要對對象作出正確的邏輯判斷，不僅需要占有大量的材料，特別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但社會主義社會以前的作家，即使是偉大的作家，都不能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特別是不能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認識社會現象，這就難免作出片面的和錯誤的結論。魯迅在創作《阿 Q 正傳》時，他還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階級觀點去分析精神勝利法，還不能看出不同階級的阿 Q 主義的不同，卻把它誤作“國民的弱點”和民族的性格，並抱着暴露“國民的弱點”以引起療救者注意的動機來創作《阿 Q 正傳》。也由於世界觀的局限，他沒有看到自己的創作動機和創作效果之間的複雜關係，只是根據個人的創作動機和典型化的特點，而引出“國人的靈魂”的結論。所以，魯迅關於“國人的靈魂”的判斷，是偉大的戰士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所發生的錯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資產階級的文艺理論家當然不願意研究魯迅前期的思想特點，也不想了解魯迅的世界觀和創作之間的全部關係。他們知道自已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因此，為了否認阿 Q 典型和阿 Q 主義的階級性，不得不死死地抓住前期魯迅的某些言論並加一番歪曲，把作者對阿 Q 的理解與阿 Q 典型的客觀意義混為一談。他自以為手段高明，實際上是耍了一場自相矛盾的把戲。大家都記得，巴人在談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之間的關係時，他寫道：“我們認為在階級社會里，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家，他們的世界觀的矛盾，他們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之間的矛盾，卻是經常出現的現象”，他反對“作者的世界觀或政治觀點是作者創作典型形象的唯一決定因素”^①的觀點。把作家的世界觀或政治觀點看作是作者創造典型形象的唯一決定因素的，是巴人，反對這個觀點的，還是巴人。資產階級人性論者為了一心一意地反對典型人物的階級性，怎麼顧得理論上的互相矛盾和彼此抵觸呢！

三

上兩節的論述表明：阿 Q 典型所概括的精神勝利現象，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幫閒文人和農民階級的落後羣都存在的。不同階級的精神勝利法有不同的階級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些共同性。因此，同就絕對的同，不同就完全不同的觀點，在這裡是說不通的。

這比較容易理解。困難還在於：精神勝利現象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所特有的嗎？這之前、之後就沒有嗎？別的民族就沒有嗎？有人是這樣肯定的。資產階級人性論者從典型形象是描寫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斷定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是亙古不滅的。巴人不是

^① 巴人：《文學論稿》，1956年版，第324頁。

說，“在我們的靈魂里，也發現有‘阿Q精神’的鬼影”嗎，不是說，“阿Q精神”“是中國人的精神特質”，正象奧勃洛摩夫精神是俄羅斯人的氣質一樣嗎^①？這些觀點，不只是关系到對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理解，還包含着重要的典型理論問題：即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它的性格核心的幅度和廣度究竟有多大？

典型性格的核心所概括的社會內容，是短時期的歷史現象，還是經久不滅的現象，決定它與什么样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相聯系。因為，一個有深刻內容的社會現象的產生、發展與消失，是同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相聯系的，有了產生它的經濟基礎，它就會出現在生活中，當消滅它的經濟基礎出現後，它也是要被消滅的。精神勝利現象也不例外。那麼，精神勝利法是什麼社會的產物呢？是私有制社會。財產的私有制、階級的对立和階級壓迫，人與人的不平等關係，這是產生和傳播精神勝利法的社會基礎，因為精神勝利法是在階級对立和階級鬥爭的過程中，是在人壓迫人和人奴役人的過程中產生的。當然，不是私有制社會的任何歷史階段都有精神勝利法。當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處於上升時期，新興的統治階級所代表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相適應，他們的利益與廣大人民的利益還有一定的聯系，階級的对立和鬥爭還不尖銳。這時，不僅廣大人民羣眾不會產生阿Q主义，新興的統治階級也是朝氣蓬勃、富有進取心和革命性的，精神上是健康的，也不會產生這種消極的現象。可是，在統治制度處於崩潰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是互相傾軋，又處於被壓迫者的反對之中，有時還有外族的侵略，這時，統治階級的腐朽和虛弱，都暴露出來了。但統治者不敢承認自己的失敗，也不甘心失敗，更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人，甚至整個統治階級，就要用精神勝利法來掩蓋自己的失敗，以安慰自己和欺騙人民，這是一定歷史狀況下剝削者的本性決定的。例如，唐肅宗為了掩蓋安祿山之亂的恥辱，竟非常忌諱“安”字，便下令更換有“安”字的郡名（如將安定郡改為保定郡，將安化郡改為順化郡，等等），幻想安祿山的姓名從此掩聲匿跡，這比起阿Q為了掩蓋癩頭瘡的缺陷，而諱說“賴”、“光”、“亮”、“燈”，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在階級鬥爭尖銳的時期，不少被壓迫者能夠看到統治階級的本性，並進行過英勇的鬥爭，如果說，他們也要用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是不符合事實的。但是，農民階級中有落後層，他們受小生產者的思想局限比較嚴重，那種自高自大的排斥異端的行为，正是思想狹隘和保守的個體生產者常有的性格，這些人也容易受到統治階級思想的毒害。他們雖然不滿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但害怕暴力反抗會使自己陷入更悲慘的處境，對凌辱和剝削他們的人，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敢咒罵而不敢作針鋒相對的鬥爭，所以也會有精神勝利法。

因此，在私有制社會，有剝削階級的精神勝利法，也有被剝削階級落後羣的精神勝利法。精神勝利現象並沒有自己獨特發展的歷史，而是隨着階級鬥爭的不同狀況，有時是普遍些、嚴重些，有時又不那麼嚴重，甚至難以察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由於數千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被打破了，并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所代替，由於入侵的帝國主義強大而野蠻，封建統治階級腐朽而迷狂，農民中的落後羣尚未覺悟，加上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影響，這樣一些歷史特點使當時的精神勝利法比歷史上更普遍更嚴重，也由於中華民族有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所以，以精神勝利法為性格核心的阿Q典型出現在當時中國的文

① 巴人：《運命集》，第91頁。

坛上，倒不是偶然的。

资产阶级人性论者歪曲阿 Q 主义产生的原因，他们根据资产阶级民族学的观点，断定阿 Q 主义是中国人固有的气质，这是十分荒谬的。在私有制社会，无论那一个民族，只要有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客观条件，便会出现精神胜利现象。举例来说，堂吉珂德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的没落绅士，他背离现实的主观主义的冒险精神就包含有精神胜利法的因素。他明明是瘦削难堪，却把自己想象为天下最美的男子。他的冒险活动并没有一次真正的胜利，而只有一连串的失败，可是他总把自己想象为胜利者。他与比斯开人交锋，被割去了半隻耳朵，但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在他的想象中，比斯开人是非常勇武有力的。有一次，他把羊群幻想为军队，对牠们猛冲猛杀，被牧羊人打断了两条肋骨，打掉了三四个牙齿，捣烂了两个指头，可是他仍然觉得精神上胜利了。他向侍从桑乔夸耀道：“‘你曾经看见过全世界上有比我更勇敢的一位骑士吗？你曾经在历史书里读到过从古以来有哪一位比我更有进攻的勇气，更有抵抗的能耐，更有打伤人的伎俩，更有打倒人的手段的吗？’”^①他认为他的冒险行为，“值得铭之于金，刻之于石，图之于画，而使子子孙孙永作纪念的丰功伟迹”^②。有时，堂吉珂德是因为缺乏现实感和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而把失败误作胜利来欣赏的。但他头脑清醒看到自己的失败时，也没有正视败北的勇气，反而责令桑乔“想也不要再去想”他的失败。每当饶舌的桑乔违了禁令时，堂吉珂德就用长矛戳刺他，或咒骂侍从是“大流氓”、“恶棍”、“贼匪”。堂吉珂德的性格核心不是精神胜利法，但他也是把缺陷幻想为优点，把痛苦幻想为欢乐，把失败幻想为胜利，把虚幻幻想为现实。这些正是精神胜利法的特点。

同样，彻头彻尾的惰性并不是俄罗斯民族的气质。无论哪一个民族，劳动人民总是勤劳的，剥削阶级总是懒惰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总是有不同程度的惰性。而没落时期贵族地主的惰性更为严重，因为产生这种惰性的寄生性、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灰色的人生观有了极大的发展。奥勃洛摩夫的惰性就是这种社会土壤的产物。一般说来，劳动人民是不会有这种惰性的，但在特殊情形下也会染上这种落后现象。例如，查哈尔由于长期受奥勃洛摩夫家族的熏陶，也变得非常懒惰了。当然，这也是阶级斗争的现象，而不是民族气质问题。

当人类历史跨过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时，人类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在这个社会里，产生精神胜利法的社会土壤——财产的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将要被剷除，皮之不存，毛也无从依附了，精神胜利法也会寿终正寝。而且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武装的人们，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自己和别人的缺点、错误，根本不需要用精神胜利法来粉饰自己。今天的中国人民再不是阿 Q 时代的人民了。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都做了主人了。”^③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和意气风发是我们人民的精

①、②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6、17页。

③ 《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一期。

神，也是我們民族的新精神，它與精神勝利法是根本對立的。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污穢我們的靈魂里有阿Q精神的鬼影。

當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長期的艱巨的事業，財產私有制的消滅需要一個過程，而徹底剷除私有制社會殘留下來的主觀意識，更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在由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中，由於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存在，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還沒有徹底被消滅，因此，剝削階級的某些分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某些人，是可能有精神勝利法的思想殘余。例如，現代修正主義者，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不僅不敢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反而露出一幅卑躬屈膝的奴性嘴臉，鼓吹他們的妥協政策和投降政策的勝利。在加勒比海的危機中，在美、英、蘇簽訂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條約中，在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中，修正主義集團明明是向帝國主義投降了，他們反而欺騙自己，欺騙世界人民，說什麼這是“明智的妥協”、“理智的勝利”，說什麼把人類從死亡的邊緣挽救回來了。這顯然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精神勝利。但是，修正主義者只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小撮叛徒，它將被革命的人民所埋葬，社會主義社會中殘存的精神勝利現象，也將被時代的革命洪流沖洗盡淨。不用說，徹頭徹尾的惰性也是與這個嶄新的社會不相容的，但它的某些因素，象懶散，象用幻想或革命的言論和計劃來代替艱巨的革命實踐，在某些革命者的身上是會保留一個時期的。列寧關於奧勃洛摩夫的論述就包含了這個意思。

顯然，精神勝利法並不是亙古不滅的現象，也決不是中國人固有的氣質，而是私有制社會一定歷史狀況下的產物。它存在私有制社會的剝削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階級的落後羣中，並非人性論者用歷史唯心主義觀點解釋的那樣：是由於人人有共同的本性。不，這是由私有制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包括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的整個私有制社會，雖然有種種的不同，但在財產的私有觀念、人剝削人和人壓迫人方面是共同的。這種共同的社會條件便產生了某種共同的思想。精神勝利現象就是其中的一種。但是，既為私有制社會、也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所共有的思想內容是不存在的，沒有也不可能概括一切人所共有的思想內容的典型。文學史上大量的典型形象只能概括一個時代一個階級的特有內容，只有阿Q這類少數典型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整個典型是屬於特定時代特定階級，但典型性格的核心在概括那個時代某一方面的本質特徵的同時，却可能、但一般也只能反映私有制社會某一方面的共同性。

典型人物既是“一個特殊世界的人們的代錶，同時還是一個完整的、個別的人。”^① 這個“特殊世界”是指典型性格的核心所反映的社會內容。對阿Q典型來說，它就是精神勝利現象。魯迅在創造阿Q典型時，他是從現實生活和時代思想出發的，他並不打算在阿Q典型中概括私有制社會某一方面的共同性，但由於選擇了精神勝利現象作為阿Q性格的核心，並深刻地挖掘和描繪了這種思想，而精神勝利現象又是在私有制社會不斷重複出現的東西，所以阿Q典型在客觀上能反映私有制歷史過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即人們在精神發展上這一方面的畸形性質。由於阿Q典型對現實概括得又深刻，又廣泛，它的意義和作用也就特別大。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一個落後農民，但阿Q主義對奴隸社會、

① 《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頁。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有精神胜利法的人，都是有典型意义的。也只有这样，阿Q才能成为“一个特殊世界的人们的代表”。懂得了这一点，才能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用“阿Q主义”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①。杜勃罗留波夫说得非常深刻，艺术家创造的典型，“好像一个焦点一样，把现实生活的许多事实都集中在本身中，它大大地推进了事物的正确概念在人们之间的形成和传播。”^②同时，典型人物还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这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定的阶级关系中，他是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特点来当“特殊世界的人们的代表”的。也只有深刻地挖掘了“特殊世界”的时代内容和阶级内容，典型形象才能获得永久的意义。因此，不论典型性格的核心的概括性如何大，他总是带有阶级的和民族的确切属性；不论典型的客观意义如何永远，他本身总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规定性。阿Q典型和阿Q主义在客观上是反映了私有制社会精神胜利现象的某些共同性，但阿Q毕竟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流浪雇农，阿Q典型和阿Q主义毕竟带着时代的和阶级的鲜明特点。否认了这种共同性是不对的，但取消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的根本区别，则是更错误的。

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其所以那么“器重”阿Q典型，其所以都要在阿Q典型问题上大做文章，用意是很恶毒的。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阿Q典型的特点，同它的复杂性与高度的概括性是分不开的，与精神胜利现象在历史上不断出现是分不开的，而鲁迅在谈他创作阿Q的过程及对阿Q的理解时，又说了一些需要作深入分析的话，这就使阿Q典型问题更为复杂了。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当然要拼命地利用这种复杂性并加以歪曲，以否认阿Q典型的时代内容和阶级内容。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们取消了阿Q这个文学史上杰出的典型形象的阶级性，也就否认了一切典型形象的阶级性，如果连艺术中最能反映社会的本质和社会矛盾的典型形象没有阶级性，那么，文学也就没有阶级性了，人也就没有阶级性了。阶级斗争也就是多余的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巴人《论人情》）？！典型形象也就应该是描写“人类的共同性”，即“人类本性”？！因此，资产阶级人性论者在阿Q典型问题上的观点，是修正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把阿Q典型当作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沿阵地，想通过这个阵地，进而否认文学的阶级性和人的阶级性。我们应该重视这个理论阵地，并给一切进攻的敌人以迎头痛击。

附：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何其芳同志和刘绶松同志的许多指导和帮助。在这里特向何其芳同志和刘绶松同志致谢。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9页，第二卷第334页。

②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第165页。